

第八章 高丽前期的佛教与政治

第一节 后三国时期的佛教

1. 罗季佛教与政治

新罗末期，政治极度混乱，自真圣王 888—898 起 韩半岛又进入了后三国分裂时期。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印证了所谓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规律。

真圣王是宪康王的妹妹，正史中她被描绘成荒淫无道的女王，不仅有作风上的问题，而且行政上也一团糟。据说她“素与角干魏弘通”^①，及魏弘卒 追谥为惠成大王。此后 潜引少年美丈夫两三人 淫乱 仍授其人以要职 委以国政。由是 佞幸肆志 货赂公行，赏罚不公 纪纲坏弛”。^① 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前者即作风上的问题应当说是封建时代帝王的特权，如果她是男人，这一点便不成问题了；后者即授‘少年美丈夫’们以‘要职’的确是不可取的。为此，她即位后的第三年，元宗、哀奴等在沙伐洲发动叛乱。同五年，在北原一带叛乱的梁吉让手下的弓裔领兵袭击北原东部落和

^①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新罗本纪第十一。

溟州管内的酒泉等地。翌六年 完山的甄萱据州自称“后百济”武州东南一带诸郡县均归其所有。同九年弓裔又击取猪足、狴川二郡以及汉州管辖内的夫若、铁圆等十余个郡县。同十年，西南地区又有赤裤贼起义。等等。

历史上，一些昏君、暴君在做尽坏事的同时，也往往兴办佛事，以此来忏悔和弥补其罪孽，求取来世的幸福。真圣女王即位第一年，就到皇龙寺设百座讲会，第二年又下令度僧六十人，甚至在她执政的第八年，还能接受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文豪崔致远所“进时务一十余条”。女王晚年，似乎也觉察到自己的过失，898年（即位第十一年）她怀着悔恨的心情对群臣们说：“近年以来，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比疑为‘皆’孤之不德也。避贤让位，吾意决矣。”于是主动地“禅位于太子”。

继位的孝恭王（898—913）是宪康王的庶子，在位十六年。这期间，差不多每年都受到弓裔和甄萱的侵扰，土地不断地被蚕食，国势越来越弱。新罗王朝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风雨飘摇了。孝恭王无子，嗣位的神德王为朴氏，乃阿达罗王远孙，其父锐谦为宪康王时的大阿谿，母为宪康王之女。五年后，景明王（917—924）即位。^① 918年，王建代替弓裔建立高丽王朝。自此，新罗每每于王建交好，共同对付后百济甄萱的势力。927年，甄萱攻破京城，景哀王（924—927）被迫自尽身亡。萱立景哀王族弟为王，是为末代君主敬顺王（927—935）。公元935年，自感“四方土地尽为他有，国弱勢孤、不能自安”的敬顺王终于举土投降高丽太祖王建，结束了新罗王朝将近一千年的统治。

新罗王朝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佛教的积极作用。然而，其后期，佛教逐渐丧失了在精神上的指导作用，成为一种徒

① 关于神德王在位时间，《三国史记》记载共六年，而文史哲出版社印行的《中日韩对照年表》只记有五年。

具形式的宗教。正如史书所指出的那样，“奉浮屠之法，不知其敝，至使闾里皆其塔庙，齐民逃于缁褐，兵农浸小而国家日衰，则几何其不乱且亡哉！”这是历史的教训。

2. 弓裔的泰封政权与佛教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有弓裔的传记。据载，弓裔是新罗王族出身，姓金，一说出自第四十七代宪安王；一说为第四十八代景文王膺廉之子，“以五月五日生于外家”。史书说他出生时“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日官奏言“此儿以重午日生，生而有齿，且光焰异常，恐将来不利于国家，宜勿养之”。国王果然敕中使抵其家杀之。使者将他放在襁褓中扔到楼下，幸得一乳婢相救才免遭于难。在乳母的掩护下弓裔慢慢地成长起来。大约在十岁时，一日乳母见其“游戏不止”遂告之曰：“子之生也，见弃于国，予不忍，窃养以至今日，而子之狂如此，必为人所知，则予与子俱不免，为之奈何！”这段经历说明弓裔刚出生时便被卷入一场宫廷内部的斗争中，而他之所以受到迫害，原因很可能就是“生于外家”。不难想像，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人养成叛逆性格，而他后来终究走上叛逆道路由此看来似乎是理固宜然了。

就在十余岁仍不能摆脱人身威胁的时候，弓裔走上了出家的道路。他至世达寺（后世称“兴教寺”）祝发为僧，自号善宗。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出家实际上是走向社会的开始。从动机上看，他的出家是寻求避难，而不是出于信仰；从日后的行为上看，他的出家无非是借佛教之名行政治之实。之于他如何实现由出家到叛逆的转变，《三国史记·弓裔传》有这样一段记述：

及壮，不拘检僧律。轩轾有胆气。尝赴斋，行次有乌鸟衔物，落所持钵中。视之，牙签书王字，则秘而不言，颇自负。见新罗衰季，政荒民散，王畿外州县叛附相半，远近

群盗蜂起蚁聚。善宗谓乘乱聚众，可以得志。以真圣王即位五年，大顺二年辛亥，投竹州贼魁箕萱。箕萱悔慢不礼，善宗郁悒不自安，潜结箕萱麾下元会、申煊等为友。景福元年壬子，投北原贼梁吉，善遇之。^①

弓裔受到梁吉的重用，分兵向东拓展基盘，当年便攻下酒泉、奈城、郁乌、御珍等县。乾宁元年即真圣女王七年（894），弓裔进入溟洲，手下已有三千五百人。因为他能“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②此后，弓裔又连破猪足、狝川、夫若、金成、铁圆等地。时间当在真圣王九年秋天。

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弓裔也积极地为开国称王作准备，比如设置各种官职，并将汉北名郡松岳郡选定为都城。（这时王建已自松岳郡来投，被封为铁圆郡太守）896年，势力扩展至僧岭、仁物、孔岩、黔浦、穴口等地。弓裔势力的强大，自然地同梁吉产生了矛盾。孝恭王三年（900），梁吉纠集北原、国原等三十余城劲兵袭击弓裔，结果兵败于非恼城下。自此，弓裔的势力越发膨胀，扬州、见州、广州、忠州、唐城、青州、槐壤等皆归其所有。天复元年（孝恭王四年，901年），弓裔正式称王。他对左右说：“往者新罗请兵于唐，以破高句丽，故平壤旧都鞠为茂草，吾必报其仇。”史家觉得弓裔的这番话“盖怨生时见弃，故有此言”。他曾“南巡至兴州浮石寺，见壁画新罗王像，拔剑击之”，可见幼时的仇恨在他心目中有多深。

天佑元年（孝恭王七年，904年），弓裔立国号为摩震，年号为武泰，下设广评省等一系列机构，并移青州一千户至铁圆城作为新京。翌年，改武泰为圣册元年。在对新罗的态度上，弓裔一直十分强硬，“令国人呼新罗为灭都，凡自新罗来者，尽诛杀之”。乾化元

①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

②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一真圣王条的记载略有出入。该条说：“八年……冬十月，弓裔自北原入何瑟罗，众至六百余人，自称将军。”

年(911)改圣册为水德万岁元年，改国号为泰封。同四年改水德万岁为政开元年。

弓裔不仅对新罗王朝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对内变态的心理也使他变得凶残暴虐、多疑急怒，“诸寮佐将吏，下至平民，无辜受戮者，频频有之。斧壤之人，不胜其毒”。这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非凡才华的王建很快成为众人心目里的中心人物，918年他率先在海东导演了一场皇袍加身的喜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短命的泰封政权始自唐大顺二年（891），至后梁贞明四年（918），凡二十八年。弓裔早年曾有过僧侣生活，占据新罗北部后，也主动地利用佛教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称王之前，他于孝恭王二年（898）设八关会。称王后，又

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帟，身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以采饰其鬃尾。使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又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又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说。^①

弓裔的信仰显然带有实用的色彩，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至于他自己，丝毫没有佛教的慈悲精神。史料说有一位叫绎聪的僧人指出他著的经卷为“邪说怪谈，不可以训”，他便以“铁椎打杀之”。贞明元年，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谏之。王恶之曰：汝与他人奸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王曰：我以神通观之。以烈火热铁杵，幢为‘撞’，其阴杀之，及其两儿”。^②

①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②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3. 甄萱的后百济与佛教

甄萱的事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均有记述。据载,萱为尚州加恩县人,本姓李,后以甄为氏。其父以农自活,光启年间(885—888)据沙弗城(即尚州)自称将军。萱自幼体貌雄强,志气倜傥不凡,曾从军入王京,又赴西南海边防戍,枕戈待敌,恒为士卒先,以战绩被提升为裨将。真圣女王在位时,看到嬖竖在侧,窃弄政柄,纲纪紊弛,加以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他自己也于真圣王六年(893)“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甄萱在取得一定的实力后仍不敢公开称王。但不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恰当的理由。他对左右说:

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后赫世勃兴,故辰卜从之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总章中,唐高宗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泚,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①

于是甄萱自称“后百济王”,设置官职。这一年,即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②

在割据政权中,甄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同梁吉、弓裔政权以及新罗政权的关系。在正式称王前,他听到“北原贼良吉雄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列传第十,《甄萱传》。

② 《三国史记》说甄萱自称后百济王的时间是“唐光化三年,新罗孝恭王四年也”。查年表,“唐光化三年”为新罗孝恭王在位第三年,而不是第四年。

强，弓裔自投为麾下”，便“遥授良吉职为裨将”。开平四年（910）因“锦城投于弓裔”的原故，双方发生矛盾，以至兵戎相见。乾化二年（912），萱与弓裔战于德津浦。贞明四年（918）王建代替弓裔后，后三国的争霸战争便在高丽、后百济、新罗之间展开了。

在现存的史书中，似乎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甄萱与佛教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从他的儿子取名“须弥强”、“金刚”这一点来看，他大致也信仰佛教。后三国时期，伽耶海印寺出现了观惠和希朗这两位华严宗名僧。后来，他们分成南北两派，其中惠观在南方成为甄萱的福田，称南岳派；希朗则在北方为高丽太祖王建出谋划策，称北岳派^①。这一点说明甄萱也在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

第二节 佛教与高丽建国

1. 太祖王建的世系

在后三国群雄逐鹿中获胜的高丽太祖王建乃松岳郡人，其世系传承在当世似乎就颇有争议。对此，《太祖实录》的作者黄周亮记述如下：

……即位二年追王三代祖考，册上始祖尊谥曰元德大王，妣为贞和王后；懿祖为景康大王，妣为元昌王后；世祖为威武大王，妣为威肃王后。^②

黄氏的记录比较简单，相比之下毅宗朝（1147—1171）金宽毅

见高丽赫连挺撰《圆通首座均如传》第四。

^② 《高丽史》第一第三页 国书刊行会。

所撰《编年通录》则详细得多。据该书记载 其先祖名虎景 自称圣骨将军，曾游历至扶苏山左谷，娶妻安家，生子名康忠。忠体貌端严，多才艺，娶西江永安村富人家女子为妻，生子宝育。康忠居五冠山摩诃岬时 听一位会看风水的新罗官员说：“若移郡山南 植松使不露岩石 则统合三韩者出矣”。于是 与郡人徙居山南 指扶苏山之南）栽松遍岳 因改名松岳郡。康忠子宝育 性慈惠、出家入智异山修道，还居平那山北岬，又徙摩诃岬”。后还俗娶妻，成为“居士”生有二女。时有新罗“术士”见其居于摩诃岬 便告诉他“居此必大唐天子来作婿矣”。这位“大唐天子”是谁呢？《编年通录》接着说：“唐肃宗皇帝潜邸时欲遍游山川 以明皇天宝二十载癸巳春涉海到溟江西浦，……至松岳郡，登鹄岭南望曰：此地必成都邑。”浪迹海东的“大唐天子”后与宝育的二女相遇 生子曰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释典，并生有四子。其长子曰“龙建”后改为“隆建”是为太祖王建的父亲。有关大唐天子的传说大约来自禅宗的灯录 闵漬的《编年纲目》引《碧岩》等禅录云：

宣宗年十三，当穆宗朝，戏登御床，作揖群臣。穆宗子武宗心忌之。及武宗即位，宣宗遇害于宫中，绝而后苏，潜出远遁，周游天下，备尝险阻。盐官安禅师默识龙颜，待遇特厚，留盐官最久。又宣宗尝为光王，光即杨州属郡，盐官杭州属县，皆接东海，为商船往来之地方。当惧祸犹恐藏之不深，故以游览山水为名，随商船流海。

.....

又，世传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学士从王游者，谓王曰：“尝闻王之先出于唐肃宗，何所据耶？肃宗自幼未尝出阁，禄山之乱，即位灵武，何时东游，至有子乎？王大惭，不能对。闵漬从旁对曰：此我国史误书耳，非肃宗，乃宣宗也。学士曰：若宣宗久劳于外，庶或然也。

照闵漬的看法 所谓大唐天子实为宣宗 而非肃宗。这样 时间上大致可以自圆其说了。对于上述传承世系，史家们已经提出各种怀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流行极广的传承说。在这一问题上，《高丽史》的作者郑麟趾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兵部尚书金永夫，征仕郎检校军器监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蓄文书，其后闵漬撰《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宗族记源录》，斥其传论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云肃宗、宣宗者，以唐书考之，则肃宗自幼未尝出阁，果如元学士之言矣。宣宗虽封光王，唐史无藩王就封之制。而其遭乱避祸之说，亦是禅录杂记二说，皆无所据，不足信也。……《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之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祖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毅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岂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无稽杂出之书邪（“邪”为“耶”）！……呜呼！自古论人君世系者，类多怪异，而间或有附会之说则后之人不能不致疑焉。今以实录所载，追赠三代为正，而宽毅等说亦世传之久，故并附。

应当说，《高丽史》作者的观点是比较允妥的。但《编年通录》的传承说 其影响毕竟既广且远。对于我们来说，《编年通录》是不是信史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谁在编造这些动人的传说，以及编造的目的又是什么。从以禅宗的灯录为依据，于是将王建的世系同李唐血统拉上关系这一点来看，故事的编造者很可能就是为高丽王朝服务的禅僧们，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想让王氏有一个高贵的血统，以及丽罗更替的必然性。

2. 道诰与高丽政权的建立

道诰是高丽佛教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奠定了高丽王朝将近五百年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从此，佛教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出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功能。现存道诰的资料，比较可靠的当推高丽崔惟清所撰《白鸡山玉龙寺先觉国师碑铭》。据此，道诰俗姓金，新罗灵岩（全罗南道）人。世系不详，或云太宗大王之后。从“唐文宗开成十一年，新罗文圣王八年丙寅，年二十矣”^①这句碑文来看，道诰当生于唐文宗太和元年，即新罗兴德王二年，亦即公元 827 年。下文说他寂于“唐昭宗光化元年（898）、新罗孝恭王二年戊午三月十日”^②，享年七十二”这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年十五 祝发出家，隶月游山华严寺 读《大经》。所谓《大经》，一般是指净土三大部中的《佛说无量寿经》。《玄义分传通记》（三）说：“大经者无量寿经，三经之中此经广故，对余二经名大经也。”净影、道绰、善导等净土诸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此外，天台宗往往也称《涅槃经》为“大经”。这里的“大经”所指虽然不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道诰早期接触的是教门的思想，也就是相对于禅门的传统佛教。五年后（新罗文圣王八年，846 年）道诰二十岁，“忽自念曰：大丈夫当离法自静，安能兀兀守文字间耶！”由此，他开始了自己信仰旅程的又一个时期，即由传统佛教转向禅宗。碑文说：

于时惠彻大师传密印于西堂智藏禅师，开堂于桐里山。师拯衣请学，凡所谓无说之说，无法之法，虚中授受，

① 这句碑文有误，唐文宗开成只有五年，之后便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因此“新罗文圣王八年”当为会昌六年，距开成元年已是第十一个年头。

② 查年表，“光化元年”也就是孝恭王元年，而不是“二年”。

廓尔超悟。年二十三，受具戒于道寺。或于云峰山下穿洞安禅，或于太白岩前结茅坐夏，又移阳县白鸡山玉龙寺，爱其幽胜，改葺堂宇，洒然有终焉之志。宴坐忘言，三十五载。

惠彻（又作惠哲，其事迹已见本书上卷）原先在义湘开创的浮石寺出家，学习华严教义。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惠彻入唐传西堂智藏禅法，二十五年后，于唐文宗开城四年（839）春归国。此时道诜已经十三岁了。回国后，惠彻得到文圣王的支持，在武州谷城郡桐里山开设道场，用二十余年的心血建成了“顿渐云集”、“贤愚景附”的大禅刹。道诜投其门下时，正值禅刹的创建阶段。因此，九山之一的桐里山，实际上也有道诜的一份功劳。在此，道诜和盘接受了惠彻所传智藏系“无说之法、无法之法”的禅法。三年后，他又至云峰山、太白岩等地修行，最后以白鸡山玉龙寺为终焉之所。

政治上，道诜同宪康王（875—886）有过交往，曾被迎至宫中讲经说法。他“每以玄言妙道开发君心”，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同惠彻如出一辙。但“未几，不乐京辇，恳请还山”之后便未见和新罗政府有任何往来了。898 年道诜去世后，孝恭王赠谥号“了空禅师”、“塔名”、“证圣慧灯”，并应道诜门人珙寂等人的请求，命瑞书学士朴仁范撰写碑文。

道诜对后世影响最大且又让世人争议最多的是他成功地运用阴阳五行说和讖语为高丽王朝的建立服务。前引金宽毅《编年通录》说王建的父亲隆建——

貌魁伟，美须髯，器度宏大，有并吞三韩之志。尝梦见一美人约为室家，后自松岳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与为婚，不知所从来，故世号梦夫人，或云以其为三韩之母，遂姓韩氏。是为威肃王后。世祖居松岳旧第有年，又欲创新第于其南，即延庆宫奉元殿基也。时桐里山祖师道诜

入唐得一行地理法而还，登白头山，至鹄岭，见世祖新构第曰：种稭之地何种麻耶？言讫而去。夫人闻而以告，世祖倒屣追之。及见，如旧识。遂与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时数，曰：此地脉自壬方白头山水母木干来落马头明堂，君又水命，宜从水之大数，作宇六六为三十六区则符应天地之大数。明年，必生圣子，宜名王建。因作实封题，其外云：谨奉书百拜献书于未来统合三韩之主大原君子足下。时唐僖宗乾符三年四月也。世祖从其言，筑室以居，是月威肃有娠，生太祖。

应当说，《编年通录》的记述的确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作者的知识是极其贫乏的，记述的内容漏洞百出。例如唐代僧人一行虽然精通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之学，但据《宋高僧传》卷五、《佛祖历史通载》卷十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本传等史料记载，他的生卒年月为唐高宗咸亨四年（763）至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他的卒年距道诜的生年正好一百周年。把他两人牵扯在一起，显系后人的安排。韩国佛教史家李能和叙述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史云：道诜入唐，得地理法而还，此误也，故削之。”^①又如，引文中道诜所说的“种稭之地何种麻耶”，这句话中的“稭”字，据李齐贤的解释，与“王言相类”，因此是一句双关的隐语。联系下一句“明年必生圣子，宜名王建”，意思是说直到王建出世这一家族才姓王，这一点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因为“父在而子改其姓，天下岂有是理”，再说王建投靠的弓裔本来就“多疑忌，太祖无故独以王为姓，岂非取祸之道乎！”李齐贤根据《王氏宗族记》，认为“国祖姓王氏，然而非至太祖始姓王也。种稭之说，不亦诬哉？”^②

这则漏洞百出的史料倒是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道诜确曾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 第一四七页。

② 见《高丽史》第一 第六页。

利用阴阳五行说为新王朝的建立服务，新王朝也积极地维持这种宗教权威，以便尽量让王权有一个神权的外衣。那么，道诰到底是怎样掌握了阴阳五行学、又怎样为新王朝服务的呢？前掲碑铭说：

始师之未卜玉龙也，于智异山瓠岭卓庵止息，有异人来谒座下，曰：弟子幽栖物外，近数百岁矣，缘有小技，可奉尊师，倘不以贱术见鄙，他日于南海汀边，当有所授。此亦大菩萨救世度人之法也。因忽不见。师奇之，寻往所期之处，果遇其人，聚沙为山川顺逆之势。眎之。顾见则其人已无矣。其地在今求礼县华严寺之下。师夜宿华严，心里见沙势，日日誊书秘录，土人称为沙岛村云。师自是豁然，益研阴阳五行之术，虽金坛玉笈，幽邃之诀，皆印在胸次。于是为王太祖，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其源皆自吾师发之。

道诰曾受到新罗宪康王的礼敬，但却在为新王朝的建立服务，这说明他是会审时度势的。闵漬《编年纲目》还记载说：“太祖年十七，道诰复至。诰见曰：‘足下应百六之运，生于天府，名墟三季，苍生待君弘济。’因告以出师、置阵、地利、天时之法，望我山川，感通保佑。”^①王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十七岁应是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此时道诰六十七岁，也就是去世前的第五年。从时间上讲，他二人的接触是有可能的。

阴阳五行学是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燕齐方士。管子称阴阳为“天地之大理”。战国末期阴阳家驺衍创“五德终始”说，以天象来预测社会历史的演变与人事的吉凶祸福。阴阳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种势力的支配，以此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王朝的更替。汉代董仲舒“始

^① 转引自《高丽史》第一 第五页。

推阴阳，以儒者宗”，即用儒家思想来阐发阴阳五行说，以天道运行、四时次序来解释社会秩序，提出“天人感应”等理论。以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来比附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风水迷信在中国的流行也很早，以此道为业的人也被称为堪舆家。《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匱》十四卷，列于五行家。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据称撰于后汉时期的《青鸟经》是风水方面的最早著作。此后，经南北朝至隋唐，阴阳风水一直都很流行。

佛教传到中国后，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阴阳五行和风水等思想的影响。比如《传灯录》记司马头陀说百丈怀海不宜居住大汾山，原因是“和尚指百丈是骨人，彼是肉山，设居之，徒不盈千”。最后，司马头陀选中百丈门下灵祐为“汾山主”。阴阳五行学传到韩国的时间也很早，据说新罗名将金庾信的庶孙严就好方术，曾赴唐学阴阳之法，长遁甲之术，大历年间回国任司天大博士。从崔致远等人撰写的碑文来看，这种思想在韩国佛教中也广为流行。上文中介绍的皇龙寺九层塔，创建的目就是为了“让九韩来伏”，这显然是风水祸福说的滥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道诰虽然不可能入唐从一行学习，但完全有可能在本国学习阴阳五行学。实际上，崔氏所作的碑铭已经表明，道诰在佛法上受学于桐里山惠彻，而在术数上则受传于瓠岭异人。由于他同王氏政权的关系非同寻常，是故高丽一代，道诰的地位屡屡上扬。《碑铭》说：“盖其功德，宜在褒大而追崇之，故显王有大禅师之赠，肃祖加王师之号，仁宗追封为先觉国师，毅宗又命刻碑以寿其传。若国师之于太祖，其事甚伟，盖先识之于降生之前，而施其效于身没之后，其神符冥契，有不可思议者。”

3. 后三国角逐中的王建与佛教

高丽太祖王建生于唐乾符四年（877）正月，时值新罗王朝走向

衰败，群雄并起，甄萱据南州称后百济，弓裔据高句丽之地，都铁圆，国号泰封，当时，王建的父亲为松岳郡沙粲。乾宁三年（896），二十岁的王建投奔弓裔，被封为金城太守。由于王建屡建战功，其爵位逐渐由阿粲升至阏粲、韩粲、波珍粲，并兼侍中之职。但是，弓裔的残暴也时常让王建望而生畏。裔“常白云：我得弥勒观心法，能知妇人阴私，若有于我观心者，便行峻法。遂锻三尺铁杵，有欲杀者辄热之以撞其阴，烟出口鼻死”。^①就这样，死于弓裔铁杵下的人不知其数。在一批不堪其苦的大臣们的策划下，贞明四年（918）六月，泰封国内发生政变，推翻了弓裔政权，建立了高丽王朝。

王建在导演皇袍加身这出喜剧的时候，又充分利用了谶纬迷信的作用。《三国史记》等史料记载，贞明四年，来自唐朝的商人王昌瑾从一位“状貌魁伟，鬓发尽白，着古衣冠”的人手中以米换得一枚古镜，后发现镜上有字，曰：“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子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显形黑金东。”于是，这位商人将古镜献给弓裔。文人宋含弘等认为：“上帝降子于辰马者，谓辰韩马韩也；二龙见，一藏身青木，一显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郡人以龙为名者之孙，今波珍粲，侍中之谓欤？黑金铁也，今所都铁圆之谓也。今主上初兴于此，终灭于此之验也；先操鸡后搏鸭者，波珍粲侍中先行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②趁此机会，宋含弘等拥戴王建，推翻了泰封政权。据说弓裔从王昌瑾处得到古镜时，曾让有司寻找镜主的下落，未果，“唯东州勃岚寺炽盛光如来像前有镇星古像如其状，左右亦持椀镜”。^③这样看来，古镜上的文字就更不同寻常，真正预示着改朝换代的“天机”了。

① 《高丽史》史第一 第十一页。

②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列传第十。

③ 《高丽史》第一第十二页。

王建取得政权后，韩半岛基本上分成新罗、高丽、后百济三股割据势力。其中，高丽和后百济的实力最强，谁要想独霸天下都必须剪灭对方；新罗虽然日薄西山，气数已尽，但却有着其他两家不可代替的正统地位。在这种形势下，聪明的王建尽量同新罗保持友好关系，让后百济和新罗发生正面冲突，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每当后百济甄萱出兵新罗，他都出面干涉，在二者之间扮演一个中间人、执法者或裁判的角色。他在回答甄萱的书信中说：“……仗义尊周 谁似桓文之霸 乘闲谋汉 唯看莽卓之奸。致使王之至尊 枉称子于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忧，以谓非有元辅之忠纯，岂得再安于社稷。以付心元匿恶，志切尊王，将援置于朝廷，使扶危于邦国。足下见毫厘之小利 忘天地之厚恩 新戮君王 焚烧宫阙，……元恶浮于桀纣 不仁甚于獍枭。”^① 书信中，王建把新罗国王比作大权旁落的周天子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仗义尊周”这同甄萱的不仁不义、残酷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国际上，他又积极地同中国交好，率先取得后唐的册封，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② 王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成功的，最后他不仅以武力削平了后百济的实力 并让新罗敬顺王感恩戴德 于公元 935 年以将近千年的江山拱手相让。

王建在建国过程中，充分利用佛教力量，这一方面是出于个人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据《东国通鉴》等史料记载 王建即位元年（918）冬 便设八关会 于阙庭置轮灯一座 四旁列香灯，又结两彩棚，各高五丈余，呈百戏歌舞于前。百官袍笏行礼，观者倾都。此后，八关会被作为每年的例行佛事。又据《高丽

《高丽史》第一第十九页。

② 如 933 年，后唐闵帝遣使册封王建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国、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册封其妻柳氏为河东郡夫人。兼赐银器、匹段物。

史·太祖本纪》记载 王建即位二年 迁都松岳郡(开城)升郡为开州 创建宫阙 并在城内创建法王寺、慈云寺、王轮寺、内帝释院、舍那寺、普济寺、新兴寺、文殊寺、圆通寺、地藏寺等十大寺院“两京塔庙肖像之废缺者并令修葺”。即位第四年(921)在五冠山(京畿道长端府西)建大兴寺 迎接僧人利严 又称“利言”居住 师事之。同五年,舍旧宅为广明寺,以瑜伽法师昙谛为住持,又创日月寺于宫城西北。同六年,福府卿尹质使梁,带回五百罗汉像,王命置海州(黄海道)崇山寺。同七年,创外帝释院、九耀堂、神众院、兴国寺。同十一年(928)新罗僧洪庆由后唐归国 带回大藏经一部 王亲自迎接,安置于帝释院。翌十二年,天竺三藏法师摩睺罗来,王备仪迎之 居龟山寺(第二年去世)十三年秋八月 创安和禅院作为大匡王信之愿堂。

王建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早年曾以庆猷和中湛等为王师,又以玄晖为国师 对利严、允多、庆甫、希朗等名僧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东国通鉴》(十二)记载道 王建尝对内奉卿崔凝说:“昔新罗造九层塔 遂成一统之业。今开京(开城)建七层塔 西京(平壤)建九层塔 冀借玄功 除群丑 欲合三韩为一家 卿为我作发愿之疏”。又据《三国史记》记载 王建在即位的第三年(920)春正月 就与新罗的景明王“交聘修好”。同年十月,当甄萱攻陷大耶城并进军进礼郡时,王建又应新罗的请求出兵干涉,赶走了后百济的军队。然而,就在接见新罗的求援使臣时 太祖王建不由自主地问道:“闻新罗有三宝 所谓丈六尊像、九层塔并圣带也。像、塔犹存,不知圣带今犹在耶?”^① 如果将王建的这席话和上面同崔凝的谈话联系起来看,他虽然表面上标榜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仗义尊周”,但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感觉到他是在“问鼎中原”。

^①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新罗本纪第十一。